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國際關係史

第六卷

(1945—1975)

第五版

主編：L. 羅賓遜 著：L. 羅賓遜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国际关系史

第八卷

(1949—1959)

本卷主编

张 志(常务) 李石生

62.57.5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慧如

封面设计：雪 声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6 插页：4 字数：359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50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关系史》编委会

主 编：王绳祖

副主编：光仁洪 蒋相泽 卫 林 周纪荣
石 磊 鲁 毅

编 委：卫 林 王贵正 王绳祖 王斯德
王德仁 王鹏飞 石 磊 卢明华
光仁洪 朱重贵 朱瀛泉 刘同舜
刘星汉 刘 陵 孙叔林 孙福生
李石生 李肇新 吴东之 吴世民
吴机鹏 何春超 张之芮 张文淳
张兴伯 张 志 张季良 陈文艺
周纪荣 洪育沂 俞 源 唐承运
曹中屏 黄鸿钊 谢益显 蒋相泽
鲁 毅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本卷作者：第一章 李石生

第二章	李铁城	
第三章	潘蓓英	
第四章	杨 铮	
第五章	殷同生	
第六章	冯特君	王 伟
第七章	郭笑文	
第八章	张 志	
第九章	周荣耀	
第十章	刘金质	罗艳华
附 录	李东燕	



—

国际关系史是社会科学领域中
的一门重要学科,不少国家都将其
列为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程,并对之
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更为重视这
门学科,已取得了不少有学术价值
的科研成果。

多卷本国际关系史,战后在国际
上影响较大的有法国学者勒努万主
编的8卷《国际关系史》,前苏联学
者葛罗米柯、赫沃斯托夫等主编
的5卷《外交史》。两书的内容均
偏重欧洲,亚非拉篇幅较少,且
各自强调本国在国际

关系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英美学者通贯古今的多卷本国际关系史著作并不多见,断代性的著述居多。如美国学者D·希尔编著的3卷《外交在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历史》;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主持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用编年体记述现代国际关系史(至60年代),共出版近50卷。这些著作均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观点。

国际关系史在中国是一门新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有的高等院校已开始研究和建设这门学科,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尤其从1980年12月成立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以来,对学科建设更为重视,学科队伍得以集中,科研项目有所落实。因此,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包括理论、历史、现状)勤奋耕耘、协同攻关,先后撰写出版了本学科的专著、教材、史纲、辞书、大事记等数十种;发表学术论文千余篇,其中有的填补了学科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编辑或编译出版了国际关系史文件集、论丛、译丛、专刊、资料选集、历史长编等数十卷;专业基础教材《国际关系史》、《近代国际关系史》、《现代国际关系史》、《战后国际关系史》(或史纲)等已编著出版多种。同时,还编著出版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综合性专业理论教材。

正是在取得阶段性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随着中国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形势的蓬勃发展,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友好交往的迅速开展,广大的国际关系史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集体努力,编著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国际关系史》。这部著作既应注重其学术性,又应重视其实际应用价值,尽可

能做到全面、系统、翔实,以供外交、政治、理论、新闻等领域的工作者以及科学研究人员参考和检索。经过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多年筹划和准备,组成了编委会,组织了撰写队伍,拟定了大纲细目,统一了编写体例,集体编著了这部 10 卷本的《国际关系史》。

二

国际关系史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复杂。但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社会一切多层次、多方面的繁杂关系通常集中反映为政治关系。因此,国际关系史是以国家与国家(包括国际组织)间的政治关系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注意国际经济关系、军事关系以及文化、宗教关系,并使之与国际政治关系紧密结合,而且也不应忽视重要历史人物在国际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长期以来,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但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时期,除各个民族国家外,又出现了许多非民族国家形式的行为主体。如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及各地区性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宗教等国际组织与集团。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各自成为单独活动的行为主体。尽管如此,它们与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相比,在国际社会中仍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它们的依靠力量仍然是各个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国家都受自己国家的制约、支配和控制。这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更增加了复杂性。

那么,应当用什么观点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和揭示

其规律呢？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据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各种理论与思潮，以及各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基础发生影响，但“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同时，在同一书信中，恩格斯还指出：历史的创造，“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每个单个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历史的“合力论”，对揭示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和结果是极其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有大量的论著，都是以唯物史观来剖析和阐述历史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故此，我们编著这部10卷本《国际关系史》，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史学科的新体系。其次，着意于探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历史发展进程，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评价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在不同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略古详今。第三，以世界经济关系为基础，探明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与前因后果，并注意其相互作用与影响。运用历史“合力”的原理来剖析国际斗争的诸多因素与表现，避免把问题简

单化。第四,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随着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中所显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反映客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尊重历史的真实性。第五,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实事求是地阐明历史事实真相,不溢美,不隐恶,履行历史学者应尽的职责。

三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国家,随之就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开始是邻国之间,进而扩大为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种关系,由此就有了国际关系及其发展进程。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因受种种客观条件所限,相互交往和联系既松弛,又不经常,多局限于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或为谋取王族的、宗教的权益而争斗。当时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格局,还未构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

从17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逐步加强,世界贸易范围不断扩大,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渐改进,促使各国和各洲之间政治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社会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在二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逐步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形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任何地区的重要事态都会影响或牵动国际关系的全局。

正是基于国际关系这一历史发展进程,这部著作着重从17世纪世界进入近代时期写起。其上限为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其下限暂定为本世纪的70年代末。全书共10卷,按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主要转折性变化,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648—1918年),即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1—3卷。

第二个时期(1917—1945年),即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4—6卷。

第三个时期(1945—1979年),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本世纪70年代末。为第7—10卷。

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国际关系,今后将继续编写和出版。

参加撰写本书的作者都是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高职称教师与研究人员,又都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会员。

本书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并得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指导和在出版方面的优先安排,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关系史》常务编委会

1995年12月

本卷前言

50年代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承前启后,是极重要的10年。承前,指这10年间一直延续着两极体系;启后,指从50年代中期起两个阵营分别从内部开始显现出一些原已存在、但处于潜伏或萌芽状态的矛盾和裂痕,后来逐渐导致国际关系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因此,50年代的国际关系有两个特点:一是两大阵营对峙,一是开始出现转折。这个转折反映了三个趋势: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激化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暴露。这三个趋势的发展、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明显标志是三个事

件：万隆会议、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总的背景既是两大阵营对峙，又是美苏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总之，50年代国际关系史的肯綮和线索在于一个转折、两个阶段和三个事件。

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战后最重大事件，它冲决了世界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使之横亘欧亚，连成一片；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时，帝国主义发动了冷战，两极对峙局面更加紧张。东欧与西欧、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北朝鲜与南朝鲜、北越与南越，都一分为二。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中国外交政策的任务是巩固革命成果、争取真正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维护世界和平。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争取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在对外关系方面，我国“另起炉灶”，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并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1949年底至1950年2月，毛泽东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新中国的成立和这一条约的签订，是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重要标志。

1954年4月，中国首先提出，并与印度、缅甸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1956年，波匈事件后我国声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更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尔后，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正式参战，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7月7日，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攻朝鲜。这是美国战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也是两大阵营间军事斗争的集中表现和第一次直接

交锋。我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朝中人民的胜利粉碎了美国侵吞全朝鲜并侵略我国东北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显示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意志和巨大力量；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树立了一个新范例。

朝鲜战争虽已停止，由于美国不愿从朝鲜撤军，朝鲜问题未能解决。美国还公开宣布增加对法国和越南保大集团的军事援助，阴谋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以便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并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越南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给了法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由于中、苏、越密切合作，争取多数，挫败了美国扩大印支战争的阴谋。5月7日，越南军民在中国协助下解放了奠边府。7月21日，签订了日内瓦协议，在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

新中国建立不久，美国就着手策划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月形的军事同盟体系，用以包围中国，并镇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加紧推行此项计划，并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朝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性质的条约，借以把上述国家和地区纳入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

中国革命胜利后，日本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变成侵朝美军的供应基地。1951年9月，美单独对日和约在旧金山签订，日本形式上获得独立，实际上依赖

并追随美国，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在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提出“多米诺理论”。9月，美国与英、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八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5年，在美国支持下，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通过这个军事集团，把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连接起来。总之，从东北亚经西太平洋、东南亚、中东、地中海、西欧到北大西洋，建立起了一个包括40多国、在美国控制下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庞大的军事条约网，作为美国争夺中间地带的一种特殊手段。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乘机恫吓西欧各国，在“遏制”苏联、对付所谓“来自东方的威胁”的名目下，加紧按其预谋推进西欧联合，并武装西德。

1951年4月，法国、西德、意大利、荷、比、卢六国签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促进了各成员国，特别是西德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法国与西德的和解，加深了西欧六国间的经济联系，为50年代后期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还不顾苏联的抗议，加紧策划武装西德。几经周折，法国的抗拒被压服后，1954年10月，《巴黎协定》终于签订。1955年5月《巴黎协定》的生效，使美国实现了武装西德、推动西德军事联合并将其纳入北约战略轨道的计划。这样，以美国为盟主、以西德为骨干的西方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形成，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的对立。

50年代前期，苏联的欧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竭力阻止美国武

装西德和建立西欧军事集团，阻止把西德拉进北约。当西方不顾苏联抗议而使图谋得逞后，苏联与东欧七国于1955年5月在华沙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决议建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从此，欧洲正式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格局，并达到顶峰。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人为了稳定内部，与组建华沙条约组织大体同时，还调整了对外政策，争取在承认欧洲现状的基础上缓和东西方关系，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如：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参加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与西德建交，与日本恢复邦交，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等。

如上所述，两大阵营对峙，即两极格局，到50年代中期已达到顶峰。50年代后期，虽然赫鲁晓夫调整了对西方政策，并采取实际措施，苏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变化，但从世界全局看，美苏两国都还力图维持两极格局，并在中间地带进行争夺。这促使国际舞台上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斗争和多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两极格局继达到顶峰之后很快开始出现瓦解的征兆。

这种征兆之一是第三世界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非两洲的独立国家很少。在大战胜利的鼓舞下，此后出现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高潮。到50年代中期，亚非两洲的新独立国家已有10多个。它们登上国际舞台，是对两极格局的巨大冲击。1955年4月，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次会议史无前例地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主持，讨论亚非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力争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大力支持这次会议的召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则极力挑拨破坏。由于与会各国代表的努力和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方针，终于克服了重重阻力，一致通过了《关于

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建议以和平相处等十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础。这次会议圆满成功，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亚非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作用，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美苏两极格局以有力的冲击。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到50年代，苏联的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粗暴行为，继苏南分裂之后又导致了許多矛盾和冲突。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共浪潮，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思想混乱。波匈两国与苏联间久有积怨，政治、经济现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秘密报告传出后，波匈潜在的种种矛盾迅速激化，终于在6月间引发了波兹南事件，10月下旬爆发了匈牙利事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了团结，平息了动乱。苏联于10月30日发表宣言，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方面有过“明显的错误”，并采取了一些改善关系的措施。

50年代中期以前，中苏关系是友好的。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两国对一些重大问题有分歧，但基本上仍坚持团结对敌。到5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建设取得了成就，军事技术有重大突破，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急剧发展，妄图控制和压服中国。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万隆会议后，亚非地区出现了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新高潮。1955年初，埃及总统纳赛尔为对付以色列的侵略，向西方要求购买武器。英法提出了埃及不能接受的条件。纳赛尔参加万隆会议后便与苏捷谈判购买武器问题，并达成了协议。在美国撤回资助